

漢

《大剛報》史研究

(1945.11—1951.12)

李理 著



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汉口《大刚报》史研究(1945.11—1951.12)

李 理 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中国·武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口《大刚报》史研究(1945.11—1951.12)/李理著.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2.8

ISBN 978-7-5609-8079-9

I. 汉… II. 李… III. 报纸-新闻事业史-武汉市-1945~1951 IV. G219.246.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35295 号

汉口《大刚报》史研究(1945.11—1951.12)

李理著

策划编辑:陈建安

责任编辑:刘丽

封面设计:秦茹

责任校对:周娟

责任监印:张正林

出版发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中国·武汉)

武昌喻家山 邮编:430074 电话:81321915

录排:华中科技大学惠友文印中心

印刷: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10mm×1000mm 1/16

印张:10.75 插页:2

字数:200千字

版次:2012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价:38.00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武汉新闻史是一座尚待开发的富矿

武汉三镇，雄踞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中国版图的中心，长江、汉水在这里汇合，历来有“九省通衢”之称。这里是物资的集散地，当然也是信息的集散地，因此成为中国新闻媒体生长的温床，在中国新闻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自开埠至今，每一个时期，这里的新闻媒体都有不凡的发展。

清朝末年。1873年8月艾小梅在汉口创办《昭文新报》，成为中国民间办报的领头人，汉口遂成为中国民办报纸的重镇，以致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八月二十四日慈禧上谕：“近闻天津、上海、汉口等处，仍复报馆邻里，肆口逞说，妄造谣言，惑世诬民，罔知顾及，极应设法制止。”（转引自《武汉新闻志》，第19页）；新式官报虽非嚆矢，但张之洞1905年4月创办的《湖北官报》，其影响不亚于“北、南洋官报”，由于“宗旨纯正，体裁严谨”，在“开民智”、“助政教”方面作用明显。

辛亥革命前后。武汉出现革命报刊出版高潮，出版报刊50多种，除少数几家官报和商报外，其余均为革命派报刊。其中，素以“军人办报宣传军人”著称的文学社机关报《大江报》，面向新军“公开倡言大乱”，吹响武昌起义的号角，成为中国革命报刊的骄傲。

民国期间。武昌起义成功后，湖北军政府1911年10月16日在武昌创办自己的机关报——《中华民国公报》，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政权的机关报，开当时省级军政府机关报的先河；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武汉成为全国政治中心，这里创办和发行报刊100余种，蔚为大观。除共产党机关报、工运报刊、农运报刊外，国共合作编辑出版的《汉口民国日报》和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均是有全国影响的大报。1927—1937年为中国新闻业发展的黄金十年，也是武汉媒体大发展的十年。在这十年中，武汉先后创办、发行的报刊有520余种。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北平、天津、上海相继沦陷，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重要机关西迁重庆途中，先行撤到武汉办公。许多有重大影响的全国性大报如《大公报》、《申报》等迁至武汉出版，大批新闻工作者和文化人云集武汉，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报刊纷纷创办，1937年11月至1938年10月，这里有140多种报刊。抗战胜利后，面临着“中国向何处去”这样的大问题，作为交通枢纽的武汉，言论界一时热闹非凡，各种报刊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1947年前后，这里曾经先后出版报刊350多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武汉的民营报纸率先实行“公私合营”，社会主义报刊体系率先建立。20世纪50年代，这里有公办报纸12种。改革开放时期，武汉的新闻业空前发展，仅报刊就有250多种。武汉的新闻教育也有相应发展，成为仅次于北京的第二大新闻教育重镇。

相对于发达的武汉新闻事业，武汉新闻史的研究似乎没有跟上。虽然《长江日报》社和武汉广电局曾经组织一些老报人收集了一些史料，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也于1991年编辑出版了《武汉市志·新闻志》，各新闻媒体也以纪念本媒体创办日为契机，编写出版了本媒体的发展史，但是尚缺少一部结构完整、史料翔实、评价客观的武汉新闻史。同时，由于缺乏扎实的个案研究，武汉新闻史上许多重大事件的史料还没有被挖掘出来。比如，开国人办报先声的《昭文新报》，至今没有找到原件，所有记载都只是根据《申报》上的两则报道而来。到底有没有这样一份报纸？如确实有，具体情况如何？比如，鼎鼎有名的《大江报》原件到底在哪里？对该报的研究都是依据二手资料，因此都流于表面，并且从《汉口商务报》、《大江白话报》到《大江报》的沿革研究也是零散的，很不系统；又比如，武汉是中国民营报纸的发源地，77年后的1950年，民营报纸退场又是从这里首先起步，这是一种巧合，还是与这里的文化有关？如此种种，都有待我们武汉的新闻史研究者下工夫。

总之，武汉新闻史是一座尚待开发的富矿，无论是通史编撰，还是个案研究，都大有可为。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汉口〈大刚报〉史研究（1945.11—1951.12）》是关于武汉新闻史个案研究的成果，是李理博士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这本书以抗日战争结束后至新中国成立初期汉口《大刚报》为研究对象，时间跨度从1945年11月（汉口《大刚报》创刊）至1951年12月（汉口《大刚报》改造为武汉市委机关报《新武汉报》）。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该书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新的进展。一是史料新。作者搜集了1945—1951年汉口《大刚报》许多第一手史料，通过对原始资料的整理，试图重新梳理汉口《大刚报》的创立与演变过程，系统描述其基本轮廓；查阅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新闻出版处接收工作档案材料；同时重视口述历史的价值，采访了多位与《大刚报》有关系或曾在报社工作过的高层领导和普通记者，还采访了《长江日报》社现任多名记者，以及《长江日报》报史研究员，积累了丰富的录音资料，可以为立论提供较为真实可信的佐证。二是观点新。摈弃革命新闻史的研究模式，将报纸分期，以符合新闻客体的发展规律为原则，提出汉口《大刚报》是合作社型的民营报纸以及民营报纸公私合营先行者的观点，摆脱了前人对报纸性质划分的浓郁政治倾向，以及刻意往“走向进步，走向人民”路线倾斜的思维窠臼。三是视角新。撷取汉口《大刚报》时期的历史横截面，在与同时

期的其他民营报纸的横向比较,与汉口《大刚报》自身衡阳时期、贵阳时期、南京时期的纵向比较的过程中,以报纸的具体办报实践和发展脉络为纬,以民营报纸的社会主义改造为经,以汉口《大刚报》这一典型个案为缩影,立体全面地窥探我国新中国成立初期对民营报纸的出路和前途的重大决策。这些对今后开展武汉新闻史研究无不有所启迪。

是为序。

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

中国新闻教育史研究会会长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吴廷俊

2012年5月于喻园



前言

《大刚报》的报人王淮冰、黄邦和一群已届耄耋之年的老报人，在沉疴熬人的岁月抢出《大刚报史》“主要是因为《大刚报》具有一般报纸没有的特点，它具有的特殊的经验与教训，是新闻史上值得研究的一块园地，应该把这些特殊的史料抢救出来”。他们曾经长期在《大刚报》耕耘过，为《大刚报》吃过苦，流过汗，只为“办自己的报”。1937年创刊的《大刚报》三遭轰炸，数次搬迁，辗转郑州、信阳、衡阳、柳州、贵阳、汉口、南京七座城市，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初期三个重要时期。在风雨如晦的抗日战争岁月，衡阳《大刚报》逐步形成“愈炸愈奋，至大至刚”的精神内质。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汉口《大刚报》在武汉创立，依旧秉承衡阳时期坚持民间报纸独立的性质。《大刚报》曾经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年代有较大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又走在新闻出版事业公私合营前列，率先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由合作社性质的民营报纸改造成为共产党的党报。这段特殊的历程在中国新闻事业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合作社性质的民营报纸与一般的民营报纸有何不同？合作社性质的民营报纸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具有何种特殊性？对这两个问题的研究还远远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和关注。本书选取汉口《大刚报》为研究对象，以组织学的视角探寻其作为合作社性质的民营报纸及改造的特点。

在中国新闻事业史上，汉口《大刚报》与同时期其他民营报纸相比具有以下特殊性。

第一，新中国成立后武汉唯一一家被允许登记继续出版的民营报纸。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中央虽并未规定所有报纸一律停刊，但是对旧有新闻媒体有一个整体评价：这些新闻宣传工具，绝大部分是反动派所掌握的，少数是中间性的，只有极少数是进步的。在许多城市中则根本没有进步的和中间性的报纸刊物。^{〔1〕}由于认识到少量私营报纸存在的必要，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中央对私营报纸实行了区别对待的政策：对国民党公开机关报全部接管，查封以民营姿态出现的反动报纸，保护进步报纸，对中间性报纸允许登记后继续出版。在当时的武汉还存在相当数量的民营报纸，为什么只有汉口《大刚报》一家民营报纸能够继续出版，这无疑值得探究。

第二，真正的“公私合营的先行者”。中共中央对新闻出版事业实行

〔1〕《中共中央关于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处理办法的决定（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八日）》，见《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189页。

汉口《大刚报》史研究（1945.11—1951.12）

了比任何其他行业更早的公私合营。“经公私合营成为国有报纸，重庆《大公报》一直在新闻史上被称为是‘公私合营的先行者’。”^{〔1〕}实际上，汉口《大刚报》要更早于《大公报》开始公私合营：从时间上看，1950年上半年开始酝酿，1950年8月26日正式签署大刚报公私合营合同；从内部改造上看，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接管部副部长王阑西就直接领导《大刚报》社，均早于重庆《大公报》。汉口《大刚报》是如何成为新闻出版事业公私合营的先行者？这一问题同样值得我们探讨。

第三，知识分子同“别人”结合的民营报纸。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中，知识分子应该对现况提出异议，代表弱势群体奋斗，摆脱不公平处境，努力破除限制人类思想和沟通的刻板印象，敢于挑战权威，敢于说真话。然而汉口《大刚报》却恰好徘徊在“靠”与“避”，“孤寂”与“结盟”之间。汉口《大刚报》的知识分子同“别人”结合所表现出来的调适（accommodation）精神，是对知识分子意识中的反对精神（a spirit in opposition）的一种吊诡。在抗战胜利后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汉口《大刚报》的报人群体以何种状态自处？知识分子同“别人”的结合指向什么？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展示了《大刚报》的与众不同之处。

最后，由合作社性质的民营报纸改造成为共产党的党报。在1949年12月的全国报纸经理会议上，时任新华社总编辑的范长江宣称“《大刚报》是合作社型的民营报纸”。^{〔2〕}以范长江当时的身份和在新闻界的地位，对《大刚报》的评价实际上传达出新政权对《大刚报》历史的肯定。随后汉口《大刚报》迅速接受改造，完成从合作社性质的民营报纸到共产党的党报的转变。

汉口《大刚报》从创刊到结束其历史使命，虽然存在的时间只有短短的六年，却经历了中国历史上极为动荡的两个时期：一为抗日战争结束以后中国政权变革时期，二为带有明显的过渡性质、结构功能和运行都很不健全的新中国政治体制的建立时期。作为民营报纸的代表，汉口《大刚报》的发展历程可以说是民营报纸在这两个时期命运的缩影，它为研究民营报纸在中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使命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历史坐标和价值观照。

李理

2012年5月于武汉

〔1〕 孙旭培：《解放初期对旧新闻事业的接收和改造》，载《新闻研究资料》，1988年，总第43辑。

〔2〕 王淮冰、黄邦和：《大刚报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第117页。



目 录

| | |
|---|-------|
| 第一章 《大刚报》的刊行历程 | (1) |
| 第一节 郑州、信阳的草创 | (2) |
| 第二节 衡阳的大发展 | (7) |
| 第三节 柳州、贵阳的流离 | (13) |
| 第四节 南京、汉口的分立 | (16) |
| 第二章 隶属南京总部的汉口《大刚报》(1945. 11—1947. 8) | (24) |
| 第一节 汉口《大刚报》的创刊与抗争 | (25) |
| 第二节 汉口《大刚报》合作社的由来与发展 | (29) |
| 第三节 汉口《大刚报》合作社的控制权 | (42) |
| 第三章 独立门户的汉口《大刚报》(1947. 8—1949. 5) | (62) |
| 第一节 解放战争后期汉口《大刚报》的生存环境 | (63) |
| 第二节 汉口《大刚报》合作社的成熟 | (70) |
| 第三节 汉口《大刚报》的生存路径 | (74) |
| 第四章 从公私合营到武汉市委机关报的汉口《大刚报》 (1949. 5—1951. 12) | (85) |
| 第一节 公私合营的先行者 | (86) |
| 第二节 汉口《大刚报》合作社的解散 | (99) |
| 第三节 中共武汉市委对汉口《大刚报》的改造 | (114) |
| 第五章 结语：大刚境遇——从合作社的同人报改造为 共产党的机关报之经验 | (136) |
| 主要参考资料 | (149) |
| 后记 | (159) |

第一章 《大刚报》的刊行历程

回想起抗战初兴的1937年，整个华北战场没有一张像样的报，《大刚报》同人热血沸腾地在郑州创办了一份宣传抗战的报纸；回想起《大刚报》创刊后，经过八年抗战，七度搬迁，千山万水颠沛历程时的苦难；回想起到信阳时，大家举起拳头宣誓“从今以后，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办自己的报”、“有福同享，有祸同当”，表示要把报纸办成一张为人民说话、为人民做主的民营报纸的决心；回想起在衡阳三次被日军轰炸，大家都愈炸愈奋的坚强意志。流离在贵阳和重庆的大刚报人，急切地筹划着如何实现战后五年在海内外十个版的梦想。大刚报人信心十足地发扬抗战时期的傻劲，把报纸办得更贴近人心，更有声色。

——《汉口〈大刚报〉七年沧桑》，黄邦和

1937年11月9日，《大刚报》由国民党官方出资，创刊于河南郑州，随后在信阳短暂出版。随着战局的变化，《大刚报》撤退到湖南衡阳，摆脱了民办官助的官报性质，成为合作社式的民营报纸；随后又迁移至广西柳州和贵州贵阳，以三遭轰炸、四次搬迁、始终坚持出版的“愈炸愈奋，至大至刚”的大刚精神驰誉国内报坛，在粤汉、湘桂、黔桂铁路沿线以及湖南、江西、广东、广西、浙江、四川等地，拥有较多的读者，并在西南后方有较大影响。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大刚报》于1945年底和1946年初先后开办了汉口、南京两版。南京《大刚报》终被国民党CC系^{〔1〕}所掠夺，汉口《大刚报》则仍坚持民营报纸的立场。武汉解放后，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接管部新闻出版处只允许汉口《大刚报》登记继续出版。1950年9月，汉口《大刚报》改为公私合营，后改造为中共武汉市委机关报。从1937年创刊到1951年终刊，《大刚报》前后共出版5072期。

〔1〕 国民党CC系是以陈果夫、陈立夫为首的一个派系。关于“CC”的由来，常见的有两种说法：其一，“中央俱乐部”英文译名为“Central Club”，简称为“CC”；其二，陈字的汉语拼音以“C”字打头，故以“CC”代表二陈。

第一节 郑州、信阳的草创

《大刚报》从1937年11月9日在郑州正式创刊到1938年6月8日在信阳复刊,经信阳过渡后于8月18日暂行停刊,完成了由国民党官方出资创办、享受国民政府津贴的官办报纸到合作社性质的民营报纸的转变。

一、《大刚报》的胚胎

《大刚报》的胚胎实际起于保定。1937年“七七事变”后,平津相继失守,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邵力子急于在华北前线办报。邵力子原为报人出身,深知报纸舆论宣传的重要性,遂发电报给驻守保定的刘峙,要求迅速出版宣传抗战的机关报。

平津沦陷以后,保定没有报纸可看,在华北战场的最前线,军民的精神食粮,的确比什么都重要……北战场没有一张像样的报,宣传太重要了。在任何艰难情形之下,都要设法出版。^{〔1〕}

刘峙时任驻豫皖绥靖公署(简称绥署)主任兼河南省政府主席,抗日战争开始后又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在抗战舆论宣传压力下,刘峙原也有在保定办报之意,正好与邵力子的坚持不谋而合。于是,由河南省政府出资25万元作为报纸筹备启动资金,并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每月给津贴2000元作为固定经费。刘峙遂派豫皖督练公署党务科长兼河南和平通讯社^{〔2〕}社长的毛健吾^{〔3〕}(见图1-1)筹备办报,毛健吾作为刘峙幕僚驻扎保定,“从事政治工作,不是打仗”^{〔4〕}。毛健吾奉命带领河南和平通讯社两名骨干王浩山和武止戈,携带一部收报机开展报纸的筹备工作。筹备期间,关于报名的选择,刘峙开始有意取名《河北民报》,但毛健吾以“报名局限性大,前途难以为继”为由,另拟“有容乃大,无欲则刚”的

〔1〕〔4〕 毛健吾:《十年回忆》,载1947年11月9日《大刚报》。

〔2〕 和平通讯社由陆海空军总司令开封行营(后改为驻豫皖绥靖主任公署)创办,1931年2月开始发稿。

〔3〕 毛健吾(1905—1968),原名毛礼健,字剑夫、剑舞,江西吉安人。

含义取名《大刚报》，“刘经扶先生圈定”^{〔1〕}同意。随后很快租定保定中山南路一号为社址，购买机器、纸张准备出版。正在此时，日军对保定发动了进攻。

飞机每天不断地狂炸保定，一个炸弹落在我（毛健吾）的床边。天有眼，幸而没有开花，要开了花，我便粉身碎骨了。^{〔2〕}



图 1-1 毛健吾与华莱士、何永偕合影(中为毛健吾)

毛健吾等人又撤退到邢台继续准备报纸出版工作，拟定于 1937 年 9 月 18 日创刊。随后石家庄失守，邢台受到威胁，报社社址被炸毁，物资全损。毛健吾料想军事形势不佳，在前线办报实属不易，萌发放弃的思想，到南京请示邵力子，是否可以停止筹办报纸。然而邵力子不仅不允许停止筹办，反而坚持要求毛健吾加快报纸筹备工作，并选择平汉、陇海两路交叉点的郑州作为出版地点。于是毛健吾当夜从南京赶回开封，迅速带领和平通讯社成员赶到郑州，快马加鞭，重整旗鼓，准备于 1937 年 11 月 15 日正式出版报纸。然而接任国民党中宣部部长的周佛海对办《大刚报》没有兴趣，电报毛健吾“中宣部经费太少，如办不好，不如不办”，而此时筹备工作已势成骑虎，于是毛健吾和总编辑刘人熙^{〔3〕}带领全体职工加紧工作，并复电中宣部“电报由开封转到，报纸已经出版”，周佛海见已成事实，于是同意报纸继续办下去，并承诺津贴到位，“不过一星期，《大刚报》就在

〔1〕〔2〕 毛健吾：《十年回忆》，载 1947 年 11 月 9 日《大刚报》。

〔3〕 刘人熙(1912—1981)，号佩兰，笔名刘庵，江西莲花人。8 岁在乡下读私塾，以后相继在吉安师范学校附小、阳明中学、吉安师范学校读书。1932 年，20 岁的刘人熙只身到开封和平通讯社社长毛健吾处谋职。毛健吾看到刘人熙的文章，颇为赏识，当即留用。1937 年随毛健吾创办《大刚报》，创刊一月余，刘人熙便从谢锡福手中接任总编辑，1942 年衡阳《大刚报》时期升任副社长，1944 年贵阳《大刚报》时期任代理社长，1946 年南京大刚报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后，任南京《大刚报》社副社长。

汉口《大刚报》史研究（1945.11—1951.12）

郑州呱呱坠地了”〔1〕。

由此可见,首先,《大刚报》出版的目的在于满足抗战的舆论宣传的需要。由国民党中宣部首肯,并接受政府和国民党的资金援助使其具有明显的党派阵营的政治背景。虽然出版的主要目的是作为“北战场的最前线军民的精神食粮”,“本报纯粹为民族战争烽火所冶炼的产物”〔2〕,但是作为党人所办的政治性报纸的最初面貌还是表露无遗。其次,由于报纸的启动资金和固定经费都来源于国民党政府,所以报纸的发展明显受到国民党要职人员的掣肘,邵力子的坚持出版和周佛海的毫无兴趣都直接影响报纸的前途。

二、郑州的创刊

抗战初期,国共两党摩擦较小,报纸受到干扰少,《大刚报》在中原一带以其新颖的面貌、犀利的言论,甫一问世就受到读者的关注和欢迎。

北战场唯一的大报,销数到达五千余份,军民似都有先睹为快之感,对于安定人心,鼓励士气,不无裨益。〔3〕

报社社长为毛健吾,下设编辑部和经理部。毛健吾由于对办报没有经验,曾请《河南民国日报》〔4〕的一位副总编辑主持很短时间的编务工作,之后就由河南和平通讯社具有丰富新闻实践经验的骨干成员刘人熙和王浩山分别负责报社的编辑部和经理部。作为和平通讯社社长的毛健吾利用通讯社本身设有的电台,可直接收发报,所以新闻稿件丰富,不仅有本埠讯、外埠讯,还有巩县电、信阳电、郑州电及省外的南昌电、南京电、太原电等,新闻时效性强;由通讯社派出的记者可以“行营(或绥署)随军记者”的身份进行战地采访,新闻报道及时,具有独家性。《大刚报》从创刊时期就引进报社建制和经营管理理念,为后来逐步完善编辑部,设立评论部,以及建立编辑出版和广告经营相分离的报纸经营机制打下了基础。

以河南和平通讯社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大刚报》既解决了草创时期编辑实力不足的难题,又以通讯社为平台聚集了河南大学的学者,形成了

〔1〕〔3〕 毛健吾:《十年回忆》,载1947年11月9日《大刚报》。

〔2〕 《社论:本报创刊九周年》,载1946年11月9日《大刚报》。

〔4〕 《河南民国日报》1930年3月10日出版,由河南省党部宣传部长张善舆兼任社长,日出石印四开小报一张,印500份,后改为日出对开铅印报一大张。由于当时每月有固定经费及中央党部补助,经济充裕,一度曾扩充篇幅至两大张,于1948年9月停刊。《河南民国日报》是当时河南两家最大的报纸之一(另一家为《河南民报》)。

《大刚报》编辑部的主要成员。初期的编辑部主要编辑有张兰舟、田涛、李蕤、张剑梅、徐景舟、何拾零，稍后还有姚散生、简蕴山。前任主笔侯裁荀时任驻豫皖绥靖公署的参议，继任主笔为毛健吾的哥哥毛礼锐，时任河南大学教师。毕业于河南大学文史系的国际新闻版编辑李蕤作为《大刚报》战地记者被派往津浦、平汉抗战前线，到豫北前线进行采访。

《大刚报》是新创办的报纸，又是民营，经费全靠自筹，因此，精打细算，艰苦创业，不装点门面，不滥用冗员。一份对开报纸，编辑部连总编室在内，不过十来个人。编辑人员都是经过公开招聘或公开考试进去的，都与报社领导非亲非故……一开始，编辑部是这样分工的：总编辑刘人熙负责全面工作，我主持国际新闻版，张兰舟、张剑梅主持国内新闻版，高一轻负责地方新闻版，田涛主持副刊《战地文学》。还有《战时社会问题》之类的副刊专栏，则是社外集稿，这些撰稿人不属于报社的正式人员。张兰舟、张剑梅是河南大学的同学，田涛是早已闻名的作家……侯裁荀曾留学美国，有较浓厚的西方民主思想，反对独裁，支持抗战。毛健吾的哥哥毛礼锐，是一位颇有名气的教育家，作风朴实，学识渊博，有学者之风。二人都住在报社，也都时而写写专论或社论，但都无明确的固定名义，属于报社的“高参”。〔1〕

三、信阳的转变

1938年5月，日寇继续南侵，5月31日刘峙在总部电话通知报社“限令报社当日撤退”，此时，距《大刚报》在郑州出版不过半年多。《大刚报》在郑州出版时由一家私人印刷厂承印，撤退前，由于战局紧张，经与印刷厂工人商量，报社决定将印刷机器与印刷工人一起运到信阳。《大刚报》于1938年6月8日在信阳复刊。限于信阳的地理环境，报纸广告发行收入骤降，每月只能完全依靠国民党中宣部的2000元津贴维持正常的报纸出版。被报社派往前线的战地记者李蕤赶到信阳，描述了《大刚报》在信阳时期的人员状况：

我找田涛，他（笔者注：编辑部传达室）说“早走了！”我问张剑梅、徐枫，回答仍是“早走了！”我找总编辑刘人熙，他冷冰冰地

〔1〕 李蕤：《我在〈大刚报〉的始末》，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郑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郑州文史资料第9辑：解放前郑州报业史料专辑》，1991年，第73—74页。

说“回江西老家了！”经问在这里负责的只有经理王浩山一个人，我只好找他。等了半天他才出来，对我寒暄几句后说：“报社刚刚迁此，复刊无期，天天有人登门逼债，员工生活无法维持，事出无奈，只有暂时疏散人员……”我结算了工资，从此断绝了与《大刚报》的关系。^{〔1〕}

毛健吾被迫把报纸改为四开，精简编辑部成员，编辑部主要人员如侯裁萄、田涛、张剑梅、徐景舟、何拾零等在郑州撤退时已经退出报社，刘人熙、毛礼锐相继避走江西，编辑部暂由张兰舟负责，另由报社招聘的严问天负责撰写社论^{〔2〕}，仍试图维持中原宣传阵地。然而，一方面报社本身经费不足，人员减少，篇幅紧缩，销路锐减；另一方面信阳北面已是敌占区，南面武汉虽人文荟萃，但《大刚报》又无法插足，至1938年8月底报社已经朝不保夕。此时刘峙已退到洛阳，并明确表态不再过问报社的事，国民党中宣部则举棋不定，一时让报社迁湖南芷江，一时又要报社迁湖北襄樊（今湖北襄阳）。《大刚报》不得不于1938年8月18日暂行停刊。随即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周佛海发来电报称“着将经费停发”，并提出“已无迁他处之必要，着令停刊”。9月20日，《河南民国日报》奉令接收《大刚报》资产，报社人员更加义愤填膺：报社的印刷设备是由郑州强借而来，并没有通知原印刷厂主，所以租借的印刷机器不属于报社财产，报社并无处置的权力；报社的人员又不属于接收资产的范围；报纸的发行骤减至3000份后，“颇不景气，最低限的开支，都难以维持”，所以报社也无利润资金。毛健吾连夜召开职工会议，最后共同决定，摆脱国民党的经费羁绊，并由毛健吾正式宣布：

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办自己的报。从现在起，《大刚报》成为大家共同的事业，凡是参加报社工作的，都是报社的主人，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再苦也决不怨悔。^{〔3〕}

一致签名拥护我继续苦干，大家都愿意共患难，同甘苦，乃定自力更生之报策，决心继续领导，苦干到底。^{〔4〕}

〔1〕 李蕤：《我在〈大刚报〉的始末》，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郑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郑州文史资料第9辑：解放前郑州报业史料专辑》，1991年，第84—85页。

〔2〕 严问天在武汉随军宣传时，看见汉口《大公报》登载“北方某大报招聘评论作家”启事，欣然写了两篇时政论文，邮寄应征。很快，严问天收到在河南信阳复刊的《大刚报》来电约去洽谈，当即离开军队赶去信阳，被该报聘请担任编辑。严维全：《严问天与〈大刚报〉》，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繁昌县委员会：《繁昌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1985年，第143页。

〔3〕 王淮冰：《毛健吾与〈大刚报〉》，载《新闻记者》，1999年1月第1期。

〔4〕 毛健吾：《我怎样办〈大刚报〉》，见程其恒、容又铭：《记者经验谈》，铭真出版社，1943年，第121页。

会议同时决定报社迁往湖南衡阳继续出版,愿者同往,不愿者各奔前程,并约定到衡阳后,报社成员不拿工资,吃集体伙食,每人每月只发五元钱作为零用。毛健吾在担任《大刚报》社社长的同时,还兼任刘峙部队的战地服务团副团长的职务,但是经过短暂的办报实践,毛健吾当场表示,辞官不做,全力以赴办好报纸。至此,《大刚报》由官方出资创办的官办报纸转变成为合作社性质的民营报纸。

第二节 衡阳的大发展

信阳的承诺使得《大刚报》焕发新生。在衡阳,从1939年11月1日正式复刊到1944年6月21日移出,是《大刚报》最有生气的一段历史。衡阳时期,《大刚报》受到衡阳军民精诚合作、浴血奋战精神的影响,与衡阳同生共长。衡阳人民可歌可泣的抗战历史是衡阳城市形成过程中不可磨灭的历史烙印,《大刚报》在反映这段历史的同时,自身也被赋予至大至刚的文化气质。经历了战争的洗礼,《大刚报》也成为不仅在衡阳而且在湘南乃至全湖南省重要的抗日救亡舆论工具。

一、发展的坚实基础

信阳暂行停刊后,毛健吾派严问天、彭凤鸣前往衡阳筹备《大刚报》复刊工作,同时安排印刷厂工人将对开印刷机器和铅字由信阳运往汉口,把报社职工家属也陆续集中到汉口,然后于1939年10月15日将印刷设备与报社人员全部运抵衡阳,预定11月1日复刊。选择衡阳作为《大刚报》的复刊地点,毛健吾是基于以下的考虑:其一,衡阳是当时东南到西南的交通枢纽和经济重镇,在这里办报具有较大的发展前景;其二,衡阳当时还没有一家比较像样的报纸^{〔1〕},湘、粤、桂、赣广大地区人民迫切需要一张消息灵通的报纸,及时了解抗战前线战况,《大刚报》易于打开局面;其三,在衡阳,毛健吾的江西同乡人脉活络,他的同乡大部分开设银行钱庄,毛健吾便于利用同乡关系取得支持,例如很快他的同乡就将珠琳巷的善堂无偿提供给报社使用。

10月25日,报社会计向社长报告,报社“告贷无门,伙食都成为大问题”。毛健吾与报社主要成员商量,决定提早出八开的临时新闻版应急。

〔1〕 当时衡阳出版的对开日报有由湖南省公路局局长刘子奇挂名做社长的《开明日报》,副社长姜夔郎、总编辑骆何民和经理黎澍共同办报,在衡阳拥有较多读者,但很快被湖南省当局查封;还有社长为谭九思的《正中日报》,此报毫无生气,日销仅一二千份,停刊日期不明。

10月26日,《大刚报》刊出抄收电讯的头条新闻“我军撤出武汉”,震动了整个衡阳,因为当天国民党新闻机关还在着力宣传武汉大会战。究竟是《大刚报》的消息灵通,还是《大刚报》乱造谣言,搅乱人心?第二天国民党撤出武汉的消息得到证实,极大地提高了《大刚报》在衡阳的声誉,同时解决了报社的经费问题。

1938年11月长沙文夕大火之初,作为交通便利的通都大邑,衡阳的地理优势还没引起重视。一时间,不仅长沙、衡阳一线没有别的报纸,由于广州沦陷,韶关、吉安等地报纸也全部停刊,湘、桂、粤、赣四个省区主要依靠《大刚报》提供消息来源,因此《大刚报》于1939年11月1日在衡阳正式复刊,社址设在湘江西岸的回雁峰上,初期日销售3000份,专电发布前方战地快讯,发行量由3000份跃到10000份以上,以后更增加到15000~16000份,破湖南报纸发行纪录。随着武汉失守,战局进入相持阶段,衡阳成为西南与东南联系的枢纽,省会各家新闻报社纷纷迁来衡阳出版发行。衡阳《力报》于1940年6月出版,用的是从长沙迁往邵阳《力报》的报头,社长为雷锡龄,总经理为戴哲明,总编辑为李幻如。报社还聘著名进步国际问题专家刘思慕为总主笔评论战争局势,编辑部还有李龙牧、李曼如、何满子、周海萍、方家达等人,才与《大刚报》并驾齐驱,互争雄长。对抗战初期《大刚报》在雁峰寺内的那一段情景有如下描述:

《大刚报》是当时全国一张大报,发行遍及中南及大后方,因为受战争影响,地区大报大都停刊,有的内迁,也尚未继续出刊。衡阳地处粤汉、湘桂两条铁路交接点,四通八达,于该报发行极为方便,从战争地区及各地来的文化界名流在此交流。加以回雁峰为历代名胜,过境览胜者也不少。

《大刚报》编辑部的人员,也大都是从当时的交流此地的大众中吸收来的。其中王淮冰、严问天、欧阳柏、黄邦和^[1]、张弓、姚江屏,是当时的闻名的记者。杨潮(即羊枣)、俞颂华、叶启芳、王晨牧、姚散生、吕亮耕、孟依帆(边城)、于友,是当时闻名的文

[1] 黄邦和(1919年至今),江西兴国人,早年通过衡阳《大刚报》招聘进入报社,在报社工作三个月后转入中山大学学习,一面继续在报社工作,一面坚持读书,半工半读一年半,获得中山大学文凭。随着战局变化,黄邦和先后随《大刚报》迁桂林、柳州、贵阳,曾和田汉、熊佛西等组织“文化垦殖团”,任秘书长。抗战胜利后第五天,他作为第一批从大后方飞回南京、上海的四名记者之一,采访日本芷江洽降与在南京投降的全过程,采访国共重庆的“双十”会谈、南京和谈以及马歇尔、司徒雷登九上庐山谈判的全过程。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武汉市唯一的记者采访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全过程。黄邦和以记者身份采访过许多历史性的重大事件,堪称我国近代新闻发展史的见证人。